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1

中唐文学思想研究

唐晓敏 / 著

.42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中唐文学思想研究



唐晓敏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文学思想研究/唐晓敏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
(博士文库)
ISBN 7-303-05554-1

I. 中… II. 唐… III. 文学理论 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9.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8528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375 字数:210千字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2.00元

总序

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一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于1983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工作。17年来,先后有839人在我校取得博士学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的业务骨干,其中一部分已成为本学科领域非常知名的学者,一部分同志则担任着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都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了系统展示北京师范大学过去17年间(特别是近几年来)博士研究生培养所取得的成绩,全面总结我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也为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决定,从公元2000年起,陆续出版《博士文库》。

2000年出版的《博士文库》除收录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外,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增加了

几部此前已经出版的学位论文,以求较为完整地反映北京师大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历程。此后,《博士文库》将主要出版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的、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成果。

《博士文库》的评审程序是,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推荐,经《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审议,确定其中优秀的科研成果推荐出版。

我们计划,每年推荐优秀成果陆续出版,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不仅能够从一个重要的视角反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变迁,同时也有利于新一代学者的培养,有利于学术的积累和发展。我们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这项工程的意义将会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到那时,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为我们曾经做过的工作而感到自豪、骄傲。

在出版业日趋市场化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斥巨资支持出版《博士文库》,表现了出版家的气魄与胆识。在此,我们代表已经或将可能从这项工程中受益的每一位学者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谢意。

《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0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唐社会变革与文学思想	(1)
第二章 儒学与中唐文学革新运动	(28)
第三章 中唐文学革新思想的演进	(47)
一、“道”之演进	(49)
二、“教”之演进	(56)
三、复古之演进	(61)
第四章 韩愈的“文以明道”与“不平则鸣”	(73)
一、文以明道	(75)
二、不平则鸣	(95)
第五章 柳宗元之道与文学思想	(112)
一、柳宗元之道	(114)
二、文学思想	(127)
第六章 白居易的讽谕诗学思想	(134)
一、讽谕诗学概观	(135)
二、情、事诗说	(144)
三、诗歌史论	(150)
附：元稹的诗学思想	(163)
第七章 刘禹锡的文学活动与文学思想	(170)

结束语 中唐文学思想的功利性问题	(189)
主要参考书目	(223)
后记	(228)

第一章

中唐社会变革与文学思想

(一)

“中唐”，首先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前人在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时，注意到它与此前文学的明显的不同之处，于是就有了与盛唐相并的“中唐”这一用语。元袁桷（1266～1327）言：“诗至中唐，变之始也。”^①到了清代，人们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如叶燮（1627～1703）言及中唐时说道：“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实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②这一时期文学的变化，实缘于社会的变革，而中唐时期的社会变革，逐渐也为人们所认识。章太炎曾言中国废兴之际，枢在中唐。柳诒征提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变之迹焉。”^③这样，中唐时期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特殊意义也就不容忽视了。

中唐时期确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变革时期。提到中唐社会的变革，人们首先会想到发生于盛唐与中唐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即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朝政府毫无准备，举止失措。叛军不久就打破潼关，攻陷长安。唐玄宗仓惶逃奔西蜀。随后，太子李亨在

① [元]袁桷：《书汤西楼诗后》《清容居士集》卷48

② [清]叶燮：《百家唐诗序》《已畦集》卷8

③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478页

甘肃灵武继位，领导着艰难的平叛斗争。经过七年零三个月的苦战，官军最终平息了叛乱，但社会遭受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战火燃烧了半个中国，繁华的东都洛阳“官室焚烧，十不存一。百业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①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也未能幸免。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朝廷因急于使叛乱平息，在精疲力尽之时，不得不对叛兵将领做了一些妥协。因此又留下了藩镇拥兵自立的后患。安史之乱由此成为唐代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的事件，不过，它之所以对唐代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一事件使唐代社会已有的复杂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安史之乱是突然爆发的，然而这种爆发自然又是社会矛盾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单是一场战乱并不能对唐代社会后期的发展有这样深远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开元、天宝时期，一直被认为是唐代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言及这一时期，人们常提及杜甫（712～770）的诗歌《忆昔》的描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本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中唐时期的杜佑（735～812）《通典》言及当时情景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走数千里，不持寸刃。”《新唐书·食货志》亦言：“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米三钱，绢一匹钱三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① 刘昫：《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同

开元、天宝时期确实可称盛世，不过，在这种太平情景的背后，社会矛盾已逐渐尖锐化。

开元、天宝与唐代初年的“贞观之治”同样被称为治世，但这两个时期实际并不相同。“贞观之治”是在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之后出现的。在隋末农民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流移。据史书记载，隋大业年间全国户数近九百万，到唐初的武德年间户数仅二百万，到了太宗的贞观时期，全国户数也不过三百万。贞观初年，以往繁华的河南、山东一带相当萧索。据魏征（580—643）讲：“今自伊洛以东，暨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①这时人口对土地尚无压力。因而在贞观之后，社会还是不断向上发展的。到了开元、天宝时期，情况已有不同。经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到天宝十三载，全国户数由贞观时期的三百万户增加到九百多万户。元结在《问进士》中记录当时的情况：“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这固然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同时，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空前强烈，土地兼并速度大大加快，无地者成为逃亡户，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加。据历史记载，此前的武后时期就有了“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②的说法。到天宝时期，逃亡户更多，唐初的均田制完全破坏了。

唐代初年实行的均田制是对北魏计口授田制度的继承。实行均田制的重要条件是国家掌握大量抛荒土地。在“高山绝壑，耒耜已满”的情况下，均田制就无法维持了。自武则天时期起，土地兼并即日益严重，到了玄宗时期已是“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③

均田制的破坏对社会政治、军事都有严重的影响。首先是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农民无以为生，大量逃亡，社会已经不安定，同时因为

① 见〔唐〕吴兢：《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8《韦思谦附嗣立传》

③ 〔唐〕杜佑：《通典》卷2《食货·田制》注

唐代的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均田制瓦解，府兵制也逐渐崩溃。

此时边患也成为严重的问题。初设都府和羁縻府州管理周边少数民族，这种做法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经济开发，使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到开元初年，唐廷几乎与周边各族都进行着激烈的战争，陷于四面受敌的窘境。“东北两番，渐多作梗，顾此失彼，有同捉襟。”^①出于边疆防御的需要，天宝年间，唐政府将边疆军事权与行政权赋予节度使，在当时，这一做法起到了加强边防的作用，然而，这也留下了安史叛乱的隐患。

社会矛盾的发展，又使唐朝统治在政治用人方面做了改变。贞观时全国户不满三百万，至开元末已经增至八百万户。土地兼并、人口逃亡等问题相当复杂尖锐。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刺激着统治者的消费欲求。政务和聚敛财富的需要，使唐玄宗在用人方面做出重要的改变，他开始重用一批道德低下而颇有聚敛才干的吏士，以取代文学人士。这种转变以开元二十四年为标志，这一年文学之士张九龄（678～740）罢相，李林甫登上相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有才能的政治家，但个人品质却很差，善于搞政治权术，他与此前的宰相张九龄等是完全不同的人，张九龄作为进士出身的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敢于向君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李林甫则不同，他对儒学无信仰，所想的主要是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任宰相职之后，媚上压下，大权独揽，朝廷再无不同声音。虽然李林甫在具体的朝廷制度建设、税收改革等方面也不无成绩，然而，在封建社会的特殊条件下，官员的道德往往比才能更为重要。像李林甫这样的人可以在具体的事情上对朝廷有帮助，但他排斥不同的意见，搞政治阴谋，对唐廷的危害却更为根本。人们认为李林甫取代张九龄任宰相是唐廷政治由盛及衰的标志，这还是有根据的。到后来，李林甫的继任者杨国忠有他的卑鄙却无其才能，不能再让安禄山畏服，到杨国忠登相位时，安史之乱已难以避免了。

① 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页

玄宗天宝年间社会问题的严重，在当时就已经为人所感觉到。杜甫在天宝十一年（752）秋天登慈恩寺塔写“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已经感到朝廷黑暗，危机四伏。他后来的《忆昔》因为是战乱之后的回忆，反而不是当时的真实情景了。

安史之乱之所以成为唐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是因为它使社会原有的矛盾暴露出来。对此，林庚曾有深刻的分析。他说道：“安史之乱后盛唐时代之所以一去不返，主要的乃是因为这时封建社会内部的经济发生了危机，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开始走了下坡路。而这些也只有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才能为人们所逐渐认识”。^①“至于安史之乱本身则不过是一个外族边将的叛乱。李白（701~762）的《古风》说：‘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唐代一百多年的顺利发展，遇到一个个别的军阀叛乱，并不足以改变它总的进程。安史之乱前后只有七年，占据长安只有两年，之后的五年就被局限在河南、河北一带，影响已是有限的了。回顾历史上，从武则天去世到唐玄宗即位的七年间，也曾经历了韦后之乱，以至于中宗被杀，朝廷处于混乱状态，西域诸国因此纷纷背离了唐王朝，情况不能说不严重。可是这并没有阻碍随之出现的盛唐时代的发展，这里的原因何在呢？这就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内部还充满朝气，政治、经济力量都在不断地上升之中，短暂的偶然事件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②林庚认为，安史之乱之所以有重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是封建社会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发生的。“安史之乱恰恰在这时出现，他削弱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统治力量；而与此同时商业却又进一步地获得发展；这样安史之乱就自然地成为划分时代的一道界碑。”^③

这就是说，在安史之乱之前，社会已经在缓慢地发生变化，这场动乱结束之后，社会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中唐时期的社会变革是一

① 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② 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③ 同上

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其范围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在中唐时期，六朝时期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的世家大族的势力大大衰落了，中国古代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人认为，中唐时期的这一变化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转折点，此前是世族地主占优势的社会，此后则是庶族地主占优势的社会。有人把此前的社会称为贵族社会，这种说法或许不是很准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世族”又称“士族”或“势族”，士族指他们重视文化，即所谓书香门第，世族是说族中有人世代为官，而势族自然是说他们有显赫的权势。世族与春秋时期的贵族不同之处是他们没有贵族的封号，在其他方面是相似的。中唐时期士族衰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变化是巨大、深远的。这是中国古社会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也有一个缓慢发展的积累过程。此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世家大族势力已经经历过一种兴起、发展和逐渐趋于衰落的过程。人们都知道，世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依侯外庐先生的研究，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大族制是古代贵族制的残余，他们凭借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而一直维持下来。这些门阀大族势力是源远流长并根深蒂固的。不过，据田余庆的看法，就政治方面而言，真正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晋时期，即“王与马，共天下”时期。此后，凭借武力上台的刘宋后来的肖齐政权就都加强了对中央权力的控制，大族对中央权力挑战不能成功，其势力渐趋衰落了。据唐长孺的研究，宋齐时代即一方面是士庶区分最严格的时代，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又是士庶趋于混淆的时代。此时高门世族业已腐朽，在心理乃至生理上都退化了。世族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出则车舆，入则扶侍，以至“肤脆骨柔”、“体羸气弱”，①无法胜任政务，同时也由于皇帝加强君主集权，必须对门阀大族加以限制，因此，朝廷政治高层职务往往由寒人专掌。他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文化修养方面了。在这方面，士族无疑是成功的，他们以出色的家学，礼法和文学艺术才能而受到尊敬。六朝时代，皇族也对此表示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

倾慕，并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向士族看齐。然而，世族渐趋衰落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

世族的衰落有多种原因，最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古代的经济特点。中国古代社会自春秋末年起，土地即可以买卖，从此土地兼并就没有停止过。在古代社会，土地兼并实际上是土地的不断集中，又不断分散的过程。集中的结果是又分散了。对此，傅筑夫有过分析，他说道：古代社会中，“尽管拥有大量地产的大地主非豪强权贵、即富商大贾，他们都是巨大的财富所有者，但是他们却又由于种种偶然的和必然的原因，而不停地将其地产分割、转让或出卖。所谓偶然的原因，系指各种偶然遭遇的以外事故使他们失势、没落、贫困或破产，以至部分地或全部地丧失祖业”，^①“所谓必然的原因，系指财产继承制度而言。”^②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一分再分之后，不论原来的地产有多大，也都因一再分割而变为零星小块。”^③

世族没落的更主要的原因在政治方面。世族与中央集权制度有内在的矛盾，世族力量强大自然是对中央权力的威胁，所以，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考虑，都不能不对世族势力加以抑制。在六朝时期，君王就已经开始抑制世家大族的势力。刘宋以来，君主多让“寒人”掌管实际权力，除了世族子弟政治素质不佳之外，也是因君主对世族存有戒心，不愿他们在政治上有过大的影响。隋唐时期的帝王更是注意抑制世家大族的势力。贞观年间，唐太宗命高士廉主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书成，将氏族分为九等，由于书中以崔姓为第一等，太宗非常不满，并敕令重修，明确规定总的修订原则是“崇重今朝冠冕”。^④虽然太宗并非反对世族本身，而主要是抬高皇族及关中世族的地位，但客观上有抑制世族高门的作用。武则天执政时期搞的残酷的政治斗

①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② 同上，第89页

③ 同上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争，尽管并非专对世家大族，但许多世族确是因此而一蹶不振。柳宗元的祖上就是如此。他的高伯祖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当时仅尚书省的柳氏就有二十二人。^①后来因卷入了政治斗争而受到沉重打击，社会地位陡落。

中唐时期世族势力进一步衰落。安史之乱就加速了世族的衰落。这场社会动乱自然不是专门针对世家大族的，然而在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中，世家大族确实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安史之乱的发动者搞的是一场叛乱，客观上却打击了世族势力，这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闻一多说道：“天宝大乱以后，门阀贵族几乎消灭干净”。^②说“几乎消灭干净”或许有点绝对，但安史之乱打击了世族势力，这倒是事实。

科举制度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对世族的一大打击。科举制度本来是在世族衰落的过程中出现的。它确立之后又加速了世族的衰落。科举制产生之前，官吏主要由世家大族推举。重视的是门第的高低，而不是个人的能力、才干。由此出现了“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齐梁时期，豪强大族的政治势力有衰落的趋向，反映在用人制度，按照才能而不是按照门第选任官吏的问题就被重新提出。梁武帝肖衍（464～549）就提出过“设官分职，唯才是务”^③的主张，不过这还是“用人”而不是“选才”，没有形成一种选才的制度。科举制度出现在隋末，唐初沿袭了杨帝时的制度，以后又逐步有所发展，按陈寅恪的说法：“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④唐代科举的发展正与士族的衰落相伴随，这不是偶然的。在科举制度的背后，是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唐长孺对此曾做过分析，说道：唐代

① 柳宗元：《送解序》《柳河东集》，中国书店1991年据1935年世界书局影印，下同

② 《闻一多先生说唐诗》郑临川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四期

③ 《梁书·武帝纪上》

④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中期以后“过去士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权和优越地位，逐渐为进士出身者所取代。由世袭性的门阀地主阶级专政转向以科举为杠杆的更广泛的非世袭性地主阶级专政，这是和封建社会后期土地转移加速、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相适应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基本阶级的对垒一如既往，但地主阶级的个别成员由于地权的迅速转移和遗产分割，却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科举制度正是维持这种个体成员变动不居的地主阶级的专政的适当形式。”^①关于唐代科举，清人徐松（1781~1848）曾言：“李唐承隋，法制大备……展公道也，在振孤寒。”^②可以说，“展公道”而“振孤寒”，这是科举制度的基本政策精神，展公道，振孤寒，就是给寒门、庶族子弟以一种平等竞争的机会。人们的社会地位是依据才华而不是依靠门第来获得的。应说明，唐代科举制度兴盛时期，世族并未消失，不过，这时他们主要不是依靠门第，而是依靠参加科举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唐摭言》卷9言：“三百年来科举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既然世家大族也需要依靠科举才能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否则“其族绝矣”，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殊优势自然大大减弱了。

科举制度给天下士人以走上仕途的机会，大大削弱了世族的政治影响。所以，世族利益的代表人物往往对科举加以反对。公元763年即安史之乱平息的当年，礼部侍郎杨綰即上书言科举事，认为科举取士造成了士风衰败，“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③他主张取消科举制度。贾至（718~772）更明确地把科举、士风与安史之乱联系起来，说道：“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④杨綰和贾至认为科举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② [清]徐松：《登科记考·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19《杨綰传》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0《文苑中·贾至传》

取士有严重的失误。杜佑《通典》也论及这一问题，认为科举及第的文学之士“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坠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杜佑提出的是科举及第的文学之士行政才能不足，杨绾、贾至则强调科举造成了士人的贪竞之风。杨绾、贾至把科举取士与士人风气相联系，并把“风化浇薄”看作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原因。杨绾、贾至的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在科举取士中确实也出现了“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①的不良现象。不过，科举取士之失自然并不是唐代中期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开元前期，玄宗任用以张九龄为首的科举出身的文士，政治并未衰落，唐代政治的变化、衰落自开元后期起，究其原因，主要倒是玄宗排斥了文学之士而重用一批粗通文墨的政客。明人胡震亨在比较玄宗前后期政治的不同时说道：“玄宗开元中宰相至十数人，皆文学士也。先是，又有魏知古等。古今词人之达，莫盛此时，继之林甫、国忠，虽天资险谄，然俱以不学称，唐治乱判矣。”^②胡震亨的看法似与杨绾、贾至正好相反。实际上，杨绾、贾至把安史之乱归因于科举制度，这反映了世族的心理。世族一直以“礼法清俭”自居，他们特别看不起庶族文人，而抨击庶族文人的武器就是“礼”、道德。不过，杨绾、贾至等人的呼吁并未发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世家大族衰落的时代，科举取士是一种历史趋势，这是无法扭转的。

总之，中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几百年间政治及思想文化方面影响巨大的门阀世族没落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种变化对士人阶层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转而作用于社会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并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唐文学革新运动就是在这时刻兴起的。

① [后晋] 刘昫：《旧唐书》卷119.《杨绾传》

② [明]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8